

《阿Q正传》的余波与回响

——鲁迅著述编年谱系中的“阿Q”踪迹

李林荣

【摘要】从《阿Q正传》1922年2月连载完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前后十四年间,围绕阿Q的形象刻画和作品的情节设置,电影、话剧等艺术样式对小说原作的改编和演绎,以及将小说翻译为俄、日、英、捷克等语种的问题,鲁迅与评论者、剧作者、中外译者和一般读者,以私人通信和公开发表杂感或书信等途径,不时展开对话和交流,由此形成了一部鲁迅本人参与其中并发挥关键作用的《阿Q正传》接受史和传播史。这既是《阿Q正传》和阿Q的艺术价值、社会意义持续增益的过程,也是鲁迅著述生涯和思想道路的许多关键信息显露于特定视角和特定侧面的鲜活见证。

【作者简介】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2022.10.66~77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著译实践编年研究”(批准号:17BZW148)成果。

一、“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鲁迅著述中的阿Q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也没有每逢出现就牵扯、关联很多忧愤深广、哀而含怒的大话题。这与《阿Q正传》在1922年2月连载完即博得广泛瞩目,并开始被文学界和舆论界生发、引申,上升为时代性、民族性、国际性的文学典型样本形成鲜明反差。这说明鲁迅对自己创作上的成功,素持低调态度,同时,他可能也并不像读者大众那样,仅把《阿Q正传》这部作品的分量或意味,聚焦在阿Q这一个点上。

1925年5月14日,《阿Q正传》全文刊出三年多后,鲁迅在写《忽然想到》系列杂感第九篇时,完整引用了当天他给匿名读者“FD君”回复的一封解释《阿Q正传》里捉拿阿Q的兵、警、团丁和侦探架起机关枪的细节是否合理的信。信中提及,读者来信质疑是在一两年前的,但名字匿为“FD君”,还不写地址,所以无从回复。而鲁迅之所以时隔许久来回复这封信,是由于他看到1925年5月9日北京各校学生为援救因纪念“五七”国耻日而遭政府逮捕的学生,齐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的新闻,颇受触动。据报载消息,事

先闻讯的政府方面提前防备,在东门增添军队,在西门架起两挺机关枪,结果真把学生阻退了。

比照这条新闻,鲁迅的感慨是,《阿Q正传》里捉阿Q而动兵动枪的细节描写非但不算“言过其实”,而且现实只能更离奇,因为阿Q的所作所为比“郁郁乎文哉”的学生请愿厉害得多。他“上城偷过东西”,而“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更何况,《阿Q正传》讲的是“十三年前的事”,那时,民国元年的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加离奇”^①。与这次仅从一个细节回顾《阿Q正传》的构思过程、更主要的用意则在对眼前时事和政界强权略施嘲讽和批判的小感慨不同,《忽然想到·九》写出后12天,也就是1925年5月26日,鲁迅在应时任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苏联顾问团成员的王希礼(Б. А. Васильев, 1899-1937)之约,为王所译的俄文版《阿Q正传》所作的序中,对《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第一次做了深入的剖白: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

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②

此外,鲁迅还进一步将造成国人精神分离、无法共感的原因,归于方块字所代表的文化垄断。“人分十等”的古训高墙的阻隔、傲岸专横的文化垄断的压迫,剥夺了人们说话的能力,更消泯了人们表达的欲念。于是,百姓只能“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并且,这样“已经有四千年”。因而,“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③。

以上这番夫子自道式的阐发,在随着俄文版《阿Q正传》于1929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前,已用中文原貌发表在1925年6月15日刊行的《语丝》周刊第31期。自此往后,世人关于《阿Q正传》主旨的种种说法和认识,都落在了鲁迅似追记又似补叙自己创作心迹的这一席话所框定的理路走向和思想范畴内。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从此成为《阿Q正传》专属或标配的创作心理说明和思想及艺术价值证词。

二、“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

好在无论是鲁迅本人,还是《阿Q正传》的有心读者,都并未完全在为沉默的国民画魂灵的意义上去理解这部作品。1926年11月21日,郑振铎在上海《文学周报》第251期发表《闲谈·呐喊》一文,以骨鲠在喉不得不发的口吻,指责鲁迅写作“随意”,并针对《阿Q正传》末章《大团圆》,提出了一个他初读“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的问题:“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④时隔半个月,身在厦门的鲁迅作专文《〈阿Q正传〉的成因》予以回应。过后来,这次回应也是鲁迅有关《阿Q正传》的论述中内容最详备、说理最系统、态度也最郑重其

事的一次。显然,郑振铎在1926年冬天发表的这段针对《阿Q正传》的商榷,戳中了鲁迅的创作意识和“阿Q记忆”里的痛点。鲁迅从郑振铎的商榷中分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阿Q应不应做革命党,二是小说收尾时该不该让阿Q“大团圆”。

关于第一个问题,鲁迅虽先说“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但在插叙几段关于《阿Q正传》是应孙伏园约稿“挤出来”的追忆之后,鲁迅又承认“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⑤。接着,就展开了正面的解释: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⑥

对鲁迅这段一波三折、婉曲含蓄的心迹表白,以往多用摘取片言只语的方式,做有意无意的曲解甚至错解^⑦。顺接上文,鲁迅自陈每有所作为“挤出来”的结果,但之所以能“挤出来”,究其根底,其实也是调动起了经年久虑的储备。因而,阿Q这一人物在作品中的归宿,并不全由鲁迅个人的想象决定,更主要的决定因素当属作家所感知和积累的社会现实经验。恰似巴尔扎克管不住他笔下人物的命运走向一样,鲁迅对阿Q的描写也有情非所愿而势在难免之处。“阿Q似的革命党”,与在中国要么不发生、一发生则只能如此的革命,无可避免总要相伴而起、相随而行。并起随行之际,二者相互定义,彼此支撑。原本是从走投无路的生存困局中迸发出的济世度人同时也自度自救的追求,一经实践,与压迫或诱惑相

遇,即立刻抄了近路,蜕变为向周遭的亲人和近旁的战友报复,甚至冲着整个社会无定向地寻仇泄恨。

在1926年岁末蜗居厦门的鲁迅的感受中,阿Q、绥惠略夫(1922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鲁迅译著《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和当时正恩将仇报、屡屡放言向他发难的高长虹,都属于同一类角色。在绝境中不甘于被制驭或白白毁灭的抗争之心,促使他们起心发愿,趋近甚至寻找改革自我与社会的道路。但一经踏出这步,却又即刻面对来自敌与友、人与己、外与内的多重分裂和多重冲突,堕入思想的暗昧、情感的纠结、目标的失落,以致被社会主流严加疏离与排斥。于是上路未已,革命就逆转、萎缩成了孤零零的个体向整个社会和生活环境的绝望破坏乃至疯狂报复。这样做,他们势必毁灭自己,但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一事无成,直接被社会毁灭。

只不过,在《阿Q正传》里,阿Q的这种逆转仅在第八章《不准革命》结尾,浓缩成了一个打算告发假洋鬼子,让他被抓进县里、满门抄斩的念头没能来得及付诸行动。从阿Q没有像绥惠略夫那样转向对众复仇的情节构思来看,鲁迅设想中的阿Q,也就是中国古老而未经革新的“人民”中的一员:由于彼此隔膜,各个孤立,一方面难以沟通心意,无法结成据以壮胆提气的同党,连本应同病相怜、声气相求的小D、阿Q和王胡们,也早已必不可少地结了冤仇;另一方面,个人品性又都偏于消极内卷,行自私自虐之术,尚怯懦阴损之风,尽失振臂高呼或发愤一擢的慷慨气魄。于是,半出于怜悯,半出于鄙薄,绥惠略夫式的复仇,在阿Q这里只能萎缩成一个支离破碎的残梦。

但阿Q并未因此得以苟活。他没有因为绥惠略夫式的实际复仇而落到像社会公敌那样不得不死的惨烈绝境,却想革命而不成,从一种被社会抛在圈外的游离孤绝状态,滑到另一种被社会排斥并且疑忌、敌视的游离孤绝状态,沦为随时随地遭人肆意处置的替罪羊和屈死鬼。假如绥惠略夫式的复仇和自戕,还从亲身轰毁自己理想的意义上,反向见证了自己追求过的理想、认同过的价值,那么像阿Q这样既

莫名其妙又势所必至的替罪而死的结局,就纯粹是无意义、无价值的灭失。在这个结局中,阿Q仅仅是作为偶然进到现实世界的一个异数被归了零。在被归零之前,他已经彻底无所依傍,见逐于现实,也离弃于梦境似的革命,因而他一经归零,唯一的变化,仅仅是抹去了他这一点异数的世界重新恢复了圆满如初之态。这也就是《阿Q正传》终章以“大团圆”为题的反讽寓意。

《阿Q正传》结尾一段暗含嘲讽,同时戳破了情节和主题层面上的双重“大团圆”:“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⑧阿Q以自己稀里糊涂的一死,还使未庄和城里这两重世界的“大团圆”,到底还是未能百分之百团圆。此外,读者想寄放在阿Q这一形象中的不论哪种过于宏大、深沉或庄重、系统的意味,也被排除殆尽。对于这样的安排,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似乎想形容得随意一些:“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⑨

前后贯穿下来,《〈阿Q正传〉的成因》总的措辞语态,与其说是在肯定郑振铎所指的“随意”和“最初写作时”的“料不到”,倒不如说在对“随意”“料不到”做解构和反驳:看似如此,且好像只能如此,但也未必尽然,“随意”和“料不到”背后,都有“不得不”的必然。事实也确是如此,依《晨报副刊》原貌^⑩,1921年12月4日《阿Q正传》以“巴人”为署名初次登报亮相之际,在原题为“这一章算是序”的开篇第一章里,就已如此后的排印版一样,明明白白预告了阿Q的结局是获罪而死。只不过,消息是透露在考证阿Q名字怎么写的一大段兜来绕去的戏言间隙:

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①

在报上连载之初,也就是《阿Q正传》开始持续构思和创作之初,就已写明阿Q死去多年,且可能留有“犯事的案卷”,足见鲁迅在郑振铎所称的“最初写作时”,对阿Q“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并不是“料不到”,而是已经料想得相当明确,毫不含糊地决定了阿Q最后要获罪死去。就这个意义来讲,《阿Q正传》虽以玩笑式的讲述从《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里问世,但它起初的构思,也和将近四年后出现的《孤独者》《伤逝》相似,属于追述已故者的故事类型。

三、“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

对明摆在《阿Q正传》文本中的上述细节,之所以后来长期乏人关注,甚至多有视而不见之误,恐怕与鲁迅本人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的忆述——“《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②——以及前节所引鲁迅回应郑振铎的那段多少有些模棱两可的话,有直接关系。这恰好说明对阿Q结局的设定,原本并非出自鲁迅刻意的考虑或从多种方案、多种构思中的费神选择,而只是沿着他一贯的思虑和感受趋向顺势所得。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八年,东京留学生爱国排满运动高潮时期,就已清晰定型于鲁迅思想里的那种痛感“国民”人格和“国民”精神一向缺乏“诚”和“爱”的体验与认知,注定要与那些经历了辛亥革命造成的巨大时代转折却一无所获,甚至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亿万阿Q似的沉默国民的灵魂相叠合。

在这过程中,阿Q们的生存法则和精神习惯将延续如昔,丝毫不损。《阿Q正传》结尾那段貌似赘语的交代和补叙,其实已在证明,根本用不了二十年,阿Q的心思、话语和神情面目在他刚被枪毙、惹起众

人议论的那一刻,就已全面复活到了未庄人和城里人身上。或者说,阿Q从未死去,真正死掉的,并不是哪一个阿Q,而是以拯救阿Q似的民众为目的的那场革命。这场革命之死,正体现在它最终排斥并反噬了它宣称要使之从奴隶状态中站起身并且活得很好的那些人。对这一局面,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为它找到了一个德语词“grotesk”(意为怪异、荒诞):“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③这种惊诧于中国当时世态之独特无匹的心境,与鲁迅此前一个月在《忽然想到,九》中表述过的感受,是相通相承的。

1927年8月8日致章廷谦信,是目前可见的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最后一次论述阿Q的文本。不过,全信主要在谈鲁迅已决定离粤赴沪,只是碍于船票紧张,加之顾颉刚发函以打官司相威胁,所以暂处静候状态。提及阿Q是顺带一笔,显示了鲁迅对顾颉刚奉陪到底且不屑一顾的轻蔑:“他用这样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④如果这不是即兴发挥的一句“好汉偏提当年勇”式的笑谈,那么也可见出《阿Q正传》创作时鲁迅确实是倾心投入,并无半点随意敷衍、任性而为之处。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与本名王林的王乔南的通信中,鲁迅首次谈到《阿Q正传》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的话题。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地形专科和北京陆军讲武堂的王乔南,当时正在北平陆军军医学校做数学教师,却根据《阿Q正传》改编出一个题为“女人与面包”的无声电影剧本,并将稿件随信寄给鲁迅征询意见。鲁迅于1930年10月13日、14日,连复王乔南5日、6日两次来信,寄还稿件的同时,很客气地肯定了王乔南编写剧本的辛苦付出:“知道重编阿Q剧本的情形,实在恰如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⑤鲁迅还表示不反对更不止旁人将他的作品改作剧本,请王乔南或编或印随意处理。但鲁迅也借题发挥,就《阿Q正传》转换为戏剧、电影等表演形式的问题,“略陈意见如下:——我的意见,以为

《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⑩。一番因好事者偶然引发的补叙，进一步加强了鲁迅记忆中《阿Q正传》创作心态里的严肃底色和深切寄托。

滑稽失之轻浅，哀怜流于煽情，这在《阿Q正传》的创作心理中属于“非所计也”^⑪的接受效果预期。无论是沉默的，还是相互隔膜的国民的魂灵，其症结、苦痛和弊病，都不在滑稽或哀怜可及的层面。借苏轼《韩愈论》中批评韩愈这样的大儒终究只是好之却不知其本，对仁义礼乐的认知都拘滞于情而未能及于性的理路，鲁迅对《阿Q正传》的根基不在滑稽和哀怜，而在国民魂灵的自察自评，也具有一种从笼统的情本体观念挣脱出来，将国民精神或国民性区分到情感和理智两个范畴、两个层次的觉悟。移用苏轼的话说，就是“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⑫。喜怒发于是非，仁义系于道德，哀乐表征情感，礼乐成之文化。道德感随是非观而至，文化品质因情感取向而生。鲁迅把《阿Q正传》特意从引发滑稽、哀怜的电影或剧本一类的文艺形式中拎出来，实际上也就是在维护和强调这部作品不止于触及礼乐，更深扎到仁义心性、非情之所及的人类魂灵这一层次的立意主旨。而电影剧本之类的改编，充其量只能传递出《阿Q正传》前一层面的浅表意味。或许是拍摄条件不济，抑或是鲁迅回信中的这些意见起了作用，王乔南的剧本《女人与面包》最终并未拍成电影，只是收进了两年后他以笔名“力工”编印的文集《滑稽电影〈阿Q〉及其他》^⑬。

在这一时期，鲁迅1930年12月6日致孙用的信，1931年3月3日以日文写给山上正义的信，同年10月13日致崔真吾、11月10日致曹靖华的信，都提到了《阿Q正传》。其中，致崔真吾一信，仅是拿《阿Q正传》顺便举例：“翻版书北平确也不少，有我的全集，而其实只三百页，可笑。但广州土产当亦不免，我在五年前，就见过油印版的《阿Q正传》。”^⑭写给山上正义的信，则是鲁迅2月27日收到山上正义寄来的《阿Q正传》日文译稿，校阅后寄还译稿时的附

言。信很简短，另纸附上的校订注解却很详细，共85条，与信同为日文。其中，第3条纠正了《阿Q正传》第一章将柯南·道尔所作的《博徒列传》称为“迭更司”所作之误。第4条说明“引车卖浆”是林琴南攻击白话的文章中，暗贬蔡元培之父、讥损蔡元培的用语^⑮。第23条以图示意，画出了阿Q在《优胜记略》一章参与的未庄赛神戏台左近的四方赌摊格局^⑯。在《阿Q正传》第二章行文中仅三段四句的赌徒吆喝和阿Q的一句兴高采烈的感叹——“‘天门两块！’”^⑰——因这一图示，而得到彻解。这又是《阿Q正传》当初的创作并非出于随意的一个明证。

中文名为林守仁的山上正义，是日本共产党早期活动家，1921-1922年间因卷入反军反战宣传事件被日本政府判刑监禁。1925年他来中国，任职于日文报纸《上海日报》社，1926年秋以特派记者身份从上海到广州，次年2月结识鲁迅。在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中，他毅然参加了1927年12月张太雷、叶剑英、叶挺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并向国际社会做了及时报道。1928年，山上正义返回上海继续从事记者工作^⑱。为使《阿Q正传》在井上红梅的译本之后能有更好的译本，他寻求鲁迅帮助，进行细致重译。

1931年二三月间书信、译稿的往还请益，使山上正义成了增田涉之外和之前，得到鲁迅本人细心指点的另一位幸运的日译者，后者同样也是在这年，于4月至7月间向鲁迅请教《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彷徨》及杂文、散文日译问题。换个角度讲，也正因山上正义和增田涉这两位日本友人的突然出现和贸然叨扰，让鲁迅备感压抑肃杀的1931年反而成了他忙里偷闲、闹中取静，难得有机会凝神回味自己20年代著作的一个特殊年份。

四、“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

此后两年内，鲁迅著述中有关阿Q的印记，主要出现在1933年5月17日作的杂文《再谈保留》、1933年7月20日作的《伪自由书·后记》、1934年10月16日作的《准风月谈·后记》中。以上三文中的“阿Q”字眼，均出自鲁迅行文间摘引报章、转录他人对自己的议论和非难之辞，不属鲁迅本人话语，也未牵连或

激发起鲁迅直接关乎《阿Q正传》的回应,可以略而不论。

在鲁迅杂文写作空前密集、杂文集结集和出版的频率及数量达最高纪录的1933年和1934年,阿Q真正重又成为鲁迅笔下的一个话题,始自1934年11月14日写的《答〈戏〉周刊编者信》。这实际上再现、延续了1930年10月复王乔南信涉及的《阿Q正传》改编话题。不同之处是,这次的由头是袁梅(即《中华日报》副刊之一《戏》周刊主编袁牧之)自《戏》周刊创刊号起开始连载的话剧剧本《阿Q》。鲁迅写的这篇回复,登载于12月25日出版的《戏》周刊第15期,发生在《戏》周刊以发表公开信和“独白”的方式,两次催促鲁迅答复对剧本《阿Q》第一幕的意见之后。同期《戏》周刊上,还登出了鲁迅11月18日见到该刊以“独白”表示未得鲁迅及时回复的抱憾声明之后,特地加写的另一封《寄〈戏〉周刊编者信》。

与四年前复王乔南的意见相比,鲁迅对袁牧之的回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切入剧作细节的具体观点。一是同意剧本把未庄设定为绍兴的某地,但也强调:“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⑤言下之意,是未庄固然露出绍兴味,但小说中这么写未庄,并非让它代表绍兴,更有涵盖、影射一切地方的用意,既是未有之庄,又似未定之庄。

回复袁牧之的第二点是:阿Q在舞台上是否讲绍兴话?如果讲了绍兴话,别的地方的观众怎么办?鲁迅对此做了设身处地的考虑,他的看法是因人、因地制宜:“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⑥为的是使对白生动,传神达意更精准。但如果换到别的地方演,则行不通。“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客

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袁剧本中从《风波》移入阿Q故事情境的角色——引者注)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⑦以上细致入微的见解,已不是单纯表达观点,更像是针对实际的戏剧演出所提的行动方案。左联和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在此清晰可见。而关于表演中人物对白在普通话或国语通行体的底本基础上,可以根据演出地观众方言及生活习俗的不同变换为不同版本的主张,则显示出与1934年6月上海文坛兴起的大众语讨论密切相关的思想旨趣。

在回复袁牧之的第二封信中,鲁迅很少见地细述了他对阿Q相貌装束的想法。借着评议《戏》周刊所载的话剧《阿Q》中的人物扮相配图,尤其是该刊第12期上叶灵凤画的“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的阿Q像,鲁迅提出了自己对阿Q造型的意见:“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⑧

与此相似的意见,亦见于日期失考的1934至1935年间鲁迅致青年木刻家刘岷的信:“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⑨由此可知,鲁迅创作当时和之后多年,对阿Q的形与神一直有极为具体、生动、详切的把握,以至一见到叶灵凤画的另副模样的阿Q像,禁不住有些不吐不快似的反感,都顾不得几天前刚表示过允许《阿Q正传》演成戏时,语言、背景、人名、道具等都可以变换,以宜地利,便于观众接受。

此外,在这封信的末尾,鲁迅还纠正了剧本中“小D大约是小董罢”一语之误:“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⑩尽管《阿Q正传》第五章《生计问题》中确有“他留心打听,才知道他们有

事都去叫小Don。这小D,是一个穷小子,又瘦又乏”^⑧的描述,但将小D解作“小同”,且定为“大起来,和阿Q一样”的角色,显然与“穷小子”“又瘦又乏”的出场人设吻合。在“生计问题”的逼迫下,阿Q、小D那场历时半点钟的“龙虎斗”,也因Q与D的类似,而显露了同病却无法相怜的荒谬幽暗底色。

五、“永远是炒阿Q的冷饭,也颇无聊”

鲁迅1935年2月23日作的《病后杂谈之余》语涉阿Q,仅为感叹时人已忘却清朝蓄辫之苦,画起阿Q像竟然都没法把辫子安排合适,未予深论。1936年1月8日致沈雁冰信,是鲁迅大病渐愈之际所写,就姚克与史沫特莱以及“周扬之流”等人事与报章见闻发了些零星感慨后,话题忽然转向了美国一家杂志正在连载王际真英译《阿Q正传》的事:“近几期的China Today上,又在登《阿Q正传》了,是一个在那边做教员的中国人新译的,我想永远是炒阿Q的冷饭,也颇无聊,不如选些未曾介绍过的作者的新作品,由那边译载。此事希便中与S一商量,倘她以为可以,并将寄书去的地址开下,我可以托书店直接寄去,——但那时候并望你选一些。”^⑨由当年1月5日致胡风信和1月17日、2月2日致沈雁冰两信,可知其时史沫特莱(即“S”)正请人将长篇小说《子夜》译成英文,拟寄往美国出版,为此曾约鲁迅作长序(从2月2日信看,似是沈本人约鲁迅作序)。鲁迅大概病体不支,所以转托胡风代写,2月2日随信寄给沈,并特别嘱咐:“但给S女士时,似应声明一下:这并不是我写的。”^⑩

在鲁迅本人和茅盾的作品经史沫特莱等人译往英语世界时,鲁迅想得更多的,是趁势将中国新进的作家、作品推介给国外可靠的译者和出版社,不止于想,还恨不得立竿见影,从速落实。他催促茅盾借与史沫特莱接洽英译《子夜》之机,问明可以收书承译的有关机构地址,殷切焦急之情溢于言表。在行将走到生命终点的1936年初,鲁迅这位自青年时起即以沉着炽热的情怀与毅力,笃志力行于“窃火煮肉”式的译著事业的笔耕者,终于发现中国新兴的作家、作品得到了被世界关注和译往国外的机会。尽管这仅仅是个微光乍现的起点,对鲁迅这代人而言,却有

预示一个可能降临的新时代意味。于情于理,他们都不能慢待,更不会等闲视之。

杂文《〈出关〉的“关”》(1936年4月30日作)、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及7月23日致普实克两信,是阿Q闪现于鲁迅著述的最后三次记录。这三次记录从不同方面,回声似的重现和延伸了早先鲁迅有关阿Q的一些说法。《〈出关〉的“关”》将1930年和1934年复王乔南、袁牧之信中对阿Q形象塑造的解释,做了更全面、确切,也更具理论色彩的阐发。《阿Q正传》的人物生成法,被推展到了与《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出关》这样的鲁迅本人的小说近作,都相应相通的宏阔背景中,进而被鲁迅认定自己在创作中一贯遵循的风格路数: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⑪

就这样,阿Q得之于“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呼应了中国艺术创作思维和表现技法的整体传统——写意传神。鲁迅小说创作方法论的精髓与中国艺术传统,由此展现出一脉相承、交互映照的紧密关联。

而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信,则再次涉及了《阿Q正传》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的话题。与1930年向王乔南表示过的宽和态度不同,1936年7月目睹了左联在内部纷争中渐趋瓦解的局面,鲁迅明显对年轻一辈文艺家激烈、“进步”的种种做派有了更多的警觉、不屑和不满:

左联初成立时,洪深先生曾谓要将《阿Q正传》编为电影,但事隔多年,约束当然不算数了。我现在的意见,以为xxxxxx乃是天下第一等蠢物,一经他们xx,作品一定遭殃,还不如远而避之的好。况且

《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⑤

对于洪深、沈西苓这样自左联成立之初即投身左翼文艺斗争的剧作家和导演,1936年的鲁迅反而未能像六年前对待政治面目不鲜明、编剧的造诣也远不及洪、沈二人精专的王乔南那样耐心,更做不到勉励其不妨一试或任意改编。鲁迅这时的态度变得严正、冷峻而又倔强,一口拒绝改编,不留商量余地,彻底打消对方欲将阿Q搬上银幕之想。据《鲁迅全集》随信注释,信中两处共八个空字“×”,系首次刊载该信手迹版的《电影戏剧》编者所删。这八个“×”,如果不是在指斥国民党当局的出版和电影审查行径,就是在批评造成左联乱局和困境的左翼阵营内部“奴隶总管”们的武断、蛮横作风。

后者所致困扰,在1936年7月饱受缠绵病苦和人事纠纷之苦的鲁迅的感觉中,已经激化到跟打上门来的挑战差不多严重的程度。此前一个多月,即1936年6月9、10日,重病中的鲁迅接连口述、审定冯雪峰笔录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介入“两个口号之争”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并于7月初刊发。此后不到一个月,即1936年8月初,鲁迅收到徐懋庸兴师问罪的来信,随即不得不强撑病体,在冯雪峰协助下以长信回应和自辩,且于8月15日公开发为公开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阿Q正传》在信中被用作实例,与《红楼梦》《子夜》并列,证明“国防文学”“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置身此时此境,鲁迅致沈西苓信中的“×”之所指,更大可能是后者。

六、“将我的作品译成捷克文……已经是给我的很大的光荣”

1936年7月23日为作品外译事复普实克信,是鲁迅在文字中谈及阿Q的绝响。对普实克拟将《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译成捷克文出版”之举,鲁迅表示:“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自然,您可以随意翻译,我都承认,许可。至于报酬,无论那一国翻译我的作品,我是都不取的,历来如此。但对于捷克,我却有一种希望,就是:当作报酬,给我几幅

捷克古今文学家的画像的复制品,或者版画(Graphik),因为这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可以同时知道两个人:文学家和美术家。倘若这种画片难得,就给我一本捷克的有名文学作品,要插画很多的本子,我可以作为纪念。我至今为止,还没有见过捷克文的书。”^⑥

依信中所述,鲁迅对普实克译《呐喊》为捷克文,之所以给予支持并表荣幸,除了客气和谦逊,恐怕更有一层对弱小民族的历史遭遇和文学抗争传统深怀共感的早年情结在后。1921年10月,即《阿Q正传》问世前两个月,鲁迅曾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发表过从捷克作家凯拉绥克(Josef Karásek, 1871-1951)的德文版《斯拉夫文学史》第二册里摘译而成的一篇《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并借文末附记赞美了捷克的历史和文学:“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也有着最富的文学。”^⑦因而,鲁迅对普实克所提“希望”,不只是为补充他个人尚无捷克文藏书的欠缺,更有想借此从民间私谊层面为中捷文艺之交流留下一份历史凭证的用意。

大概鲁迅这种不取稿酬的做法,使普实克觉得不解或过意不去,1936年9月27日他给鲁迅回信表达了坚持付酬或欲究其详之意。结果,又引得第二天鲁迅再次写信给普实克,为同一件事重做说明:“我同意于将我的作品译成捷克文,这事情,已经是给我的很大的光荣,所以我不要报酬,虽然外国作家是收受的,但我并不愿意同他们一样。先前,我的作品曾经译成法、英、俄、日本文,我都不收报酬,现在也不应该对于捷克特别收受。况且,将来要给我书籍或图画,我的所得已经够多了。”^⑧这番重申,今天看来,也具有披露鲁迅对自己作品译往外语世界的一贯态度和一贯原则的特殊意义。写完这封信后整整三个星期,即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溘然长逝。

一部不经意间断续连绵的鲁迅本人阐释和传播《阿Q正传》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事实上,由于这部阐释史和传播史的存在,《阿Q正传》和阿Q这一人物形象作为经典文本、社会话语符号以至民族

心理和时代记忆的一抹投影或一种标识,远未封印或凝固在1922年2月2日鲁迅将《阿Q正传》的终章《大团圆》手稿誊好寄给《晨报副刊》编辑何作霖的那一刻。相反,自此往后,阿Q在小说文本内外的意义生发和衍化,益趋活跃,起伏波折,变幻多端,交织于鲁迅著述累积和思想迁延的十四年历程之中,伴随了鲁迅生命轨迹的几番转捩,最终使阿Q和《阿Q正传》获得了超文本的丰富意蕴与充分社会化的超文学价值。

注释:

①鲁迅:《忽然想到(七至九)》,《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②③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1页,第82页。

④西谛(郑振铎):《闲谈·一呐喊》,《文学周报》第251期,1926年11月21日。

⑤⑥⑨⑫⑬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78页,第379页,第380页,第380页,第380页。

⑦通过摘引《〈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的这段话,来论证阿Q这一人物形象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受压迫的农民或人民的斗争自发性和革命自觉性,进而辨析鲁迅本人对此究竟是持肯定、赞扬,还是否定、批判,抑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分为二态度,已成《阿Q正传》百年接受史和研究史上聚讼不息的一大热点和疑团。认为鲁迅持肯定态度和取折衷立场者,多集中于引述、阐发这段话的前三句。而认为鲁迅持否定态度者,则着力于把握这段话的后三句,尤其是“阿Q似的革命党”一语,甚至直接以辛亥革命相比附。近年这方面的研究渐显整合突围之势,但总的结论和思路仍未完全脱出以上诠释模式。前者以汪晖的《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为代表,主张阿Q趋向革命有基于直觉的本能驱使和基于意识的秩序轮回两重内因。后者以谭桂林的《如何评价“阿Q式的革命”并与汪晖先生商榷》(《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为代表,主张阿Q要做革命党仍是精神胜利法的表现。

⑧②③④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7页,第492—493页,第504页。

⑩现存《阿Q正传》手稿,仅有第六章开头部分残页,且源自1935年4月20日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陈望道编辑的《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3期上的半页图版翻印版,而非鲁迅墨迹原件。

⑪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488—489页;巴人(鲁迅):《阿Q正传·第一章 这一章算是序》,《晨报副刊》(报头字样为“晨报副镌”)1921年12月4日。全集版引文的后两句,在报载原版中连为一句,“我虽不知道……”前为逗号。其余字句标点细节,两版无异。

⑫鲁迅:《270808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69页。

⑬鲁迅:《301014致王乔南》,《鲁迅全集》第12卷,第28页。

⑭鲁迅:《301013致王乔南》,《鲁迅全集》第12卷,第26页。

⑮“非所计也”,意谓不在考虑和预设之中,或即使出现某种情况也在所不惜。鲁迅1932年1月以此为题写过批评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对日交涉颓废无能的杂感《“非所计也”》(《鲁迅全集》第4卷,第421—422页)。本文此处仅借用其字面意思。

⑯苏轼:《韩愈论》,《苏轼文集》第一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115页。

⑰《滑稽电影〈阿Q〉及其他》一书作者署名“力工”,书末版权页显示“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初版”,但未注明出版机构,仅列了“代理发行处 和平门外文化学社 东华门外东华书店”及平津两地若干代售处。

⑱鲁迅:《311013致崔真吾》,《鲁迅全集》第12卷,第58页。

⑲⑳参见鲁迅:《310303致山上正义》,《鲁迅全集》第13卷,第457、463—464页,第459、464—465页。

㉑参见于振铎:《〈阿Q正传〉的译者山上正义(上)》,《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1期。

㉒⑳㉑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5—146页,第146页,第147页。

㉓㉔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50页,第151页。

㉕鲁迅:《致刘岷》,《鲁迅全集》第13卷,第679页。

㉖鲁迅:《360108致沈雁冰》,《鲁迅全集》第13卷,第287—288页。

㉗鲁迅:《360202致沈雁冰》,《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0—301页。

㉘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第518—519页。

㉙鲁迅:《360719致沈西苓》,《鲁迅全集》第13卷,第397页。

㉚鲁迅:《360723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鲁迅全集》第13卷,第662—663页。

㉛鲁迅:《〈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419页。

㉜鲁迅:《360928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鲁迅全集》第13卷,第671—672页。